

直臣孙嘉淦与大清第一名疏

□ 赵 威

人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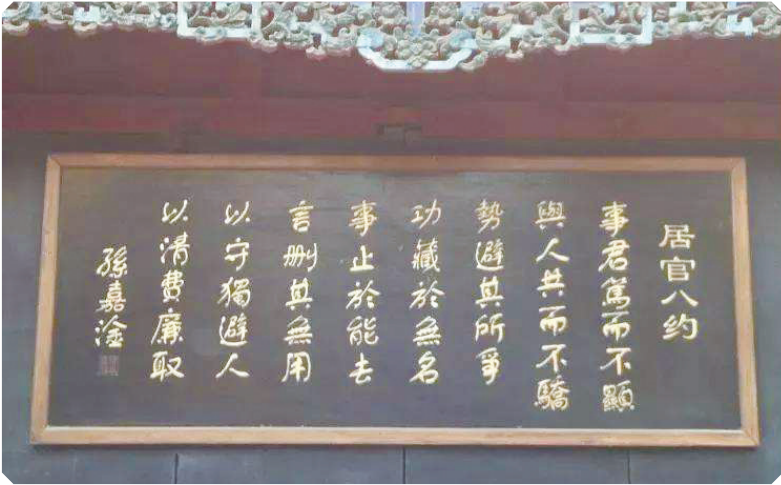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清朝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大案，当时皇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称查获一奏稿，该奏稿假托直隶名臣孙嘉淦的名义，除却批评当朝重臣外，更是列数皇帝之种种失德，措辞令首先奏报发现伪奏稿的封疆大吏逊色“不胜骇异”。而且，当时伪奏稿已经传遍十七行省。皇帝接获奏报后，整个朝廷动员起来，彻查伪奏稿的始作俑者，然而经过两年的追查，并无结果，最后只能找了几个替罪羊，草草了案。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可以找到关于此案的先朱批奏折，其中很多提到后面附有伪稿，但皆无存，可见，此案了结后，伪稿就被一并抽出销毁。如今只能通过追查此案奏折、上谕找到蛛丝马迹，大致勾勒一下，有“五不解、十大过”，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皇帝南巡；二是替被皇帝冤杀的张广泗鸣冤；三是逼劾重臣，把满朝文武骂个遍。

这样一份奏稿，无论对谁而言，被署上自己的名字，都不是闹着玩的。只是万事都有个因由，为何孙嘉淦的名字被“套牌”呢？

孙嘉淦直臣之名的由来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太原府兴县人。他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仕康雍乾三朝，历任学政、盐务、河工等要职，官至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雍正即位后，31岁的孙嘉淦时任翰林院检讨，上疏劝皇帝三件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停止对西部用兵）。

另两件事也就罢了，这第一就是“亲骨肉”，戳到了雍正的痛处。雍正看罢，暴跳如雷，将他的疏文



交给大臣们议处，气恼地说：“翰林院岂能容此狂妄书生？！”谁都不敢接皇帝的茬儿。翰林院的人捅了篓子，管理翰林的掌院学士朱轼难辞其咎，他硬着头皮慢条斯理地说：“孙嘉淦确实狂妄至极，但臣佩服他的胆量。”头半句顺着皇帝的意思——这小子就是狂得不行了，后半句却说了句大实话。此话还真起了死马当活马医的效果，雍正听后先是沉默，后转怒为笑地说：“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一场危机就这样被朱轼化解了。

孙嘉淦因祸得福，由翰林院检讨升为国子监的教习，从此以直言进谏的“直臣”闻名于世。雍正四年（1726年），升孙嘉淦为国子监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宋儒、方从仁等人在国子监学习期满毕业，孙嘉淦觉得二人不错，想让他们留下来当教习，便向皇帝推荐说：“这二人都有学问，可委以重任。”皇帝不同意，孙嘉淦的牛脾气上来了，居然当面顶嘴，惹得皇帝一气之下把笔扔到地上，说：“你给这俩人写个保证书吧。”孙嘉淦捡起笔来就想写，旁边的某大学士看到这一幕，大喝一声：“你敢动御笔吗？”孙嘉淦这时才回过神来，慌忙捧笔叩头请罪。

后来，孙嘉淦发现这个方从仁的所作所为的确不尽如人意，上疏说：“方从仁有些名不副实，不值得重用。”皇帝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斥责他反复无常，欺蒙圣上，

撤职查办，交给刑部治罪，被发配到户部的银库里干杂活。

孙嘉淦来到银库，老老实实干活。而此时的户部尚书是果亲王允礼，他觉得孙嘉淦从御前南书房行走，一落千丈，成为一个小小的银库管理員，肯定是一肚子怨气。市面上有些流言蜚语，说孙嘉淦为了收买人心，落个好名声，对收进来的银两一概不加核对。于是，允礼来了个实地调研，先是突击检查账目，所查结果与传言完全两样。接着来到库房，看到孙嘉淦和其他差役一样，各种杂活都干，又是记账，又是搬运，拿着秤杆仔细称量每份银子，将自己所收银两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取时，不厌其烦地再称一遍，两相核对，没有丝毫差错。允礼将调研的结果报告给了皇帝，孙嘉淦愈加受到器重，雍正十二年，授命他署理河东盐政。

《三习一弊疏》直陈利弊

1735年，弘历即位，年号“乾隆”。新皇帝当即把孙嘉淦召回京城，授吏部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这年他54岁。显然，乾隆帝相中了他有“诤言”这点，刚正不阿，适合做御史。果然，孙嘉淦没让皇帝失望，也没让天下人失望，立马上成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这篇1800余字的名疏，概言之就是：“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

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孙嘉淦的论述非常精辟。“三习积一弊”的典型例子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齐桓公与管仲。在管仲辅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后来喜欢上了竖刁、易牙、卫开方三个人。史书记载，竖刁善于烹饪，烹了自己的儿子让齐桓公尝鲜；易牙为了接近齐桓公，自宫后进宫服侍他；卫国公子开方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忠心，15年没回国探望父母。管仲临终劝齐桓公远离这三个人，“近必乱国”。管仲活着的时候可以替桓公挡住小人祸水不泛滥，死了就等于是没了堤坝，桓公虽然把这三个人赶走，但没多久又耐不住寂寞把他们召回来了。后来，这三个人各自投靠一位公子结党，谋求太子之位。他们砌墙把宫殿的门堵死，不让齐桓公见外人，将其活活饿死。与其说齐桓公死在三人之手，不如说他是被自己“喜小人而厌君子”所害。诸葛亮也曾这样告诫过刘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三习一弊疏》被后世誉为“大清第一名疏”，甚至到了嘉庆、道光朝，天子初登大位，仍有大臣抄录这篇奏疏上奏，给皇帝提醒。曾国藩在《鸣原堂论》中说起此疏，评论道：“我当年在京城时，就听朋友们说这是本朝第一奏议，当时我觉得文采并不高，也就忽视了。近来，细细读之，感悟很深，一般人很难避免孙嘉淦所言‘三习一弊’，但是能总结出这种经验教训，不仅需要大智慧，而且自身也得具备慎独的功力才行，的确是为官者的第一良鉴！”

古语云，忧危之中，方见直臣之节。直臣，就是以谏诤之态直言谏诤之臣。直臣有“三攻”：攻君之过，攻官闾之过，攻皇亲国戚之过。照此标准，清代的孙嘉淦堪称“直臣”。他的《三习一弊疏》，即便今天读来，仍如芒在背，不失为官者一篇有益之鉴。



约翰·D·洛克菲勒与年幼的戴维·D·洛克菲勒

们，做到基业长青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情，对自己下一代的期许不能只停留在让他们继承家业的程度。做大一个企业不易，培养好下一代或许更难。一些富二代之所以被人诟病，主要原因就是财富来得太容易，从而失去了打拼的动力与激情，结果就是家庭事业难以常青。或许，老洛克菲勒对子女设立信托财产并进行各种细致安排，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昭襄王在位56年，是秦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虎狼之王锻造虎狼之国。虎狼之威不仅在于勇猛刚烈，更在于深谋远虑、刚毅坚定，法术势皆为所用。远攻齐楚，近谋三晋，秦在竞争激烈的大时代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一圆满地完成阶段性目标。

国赖明主

有人认为在范雎进谏之前，昭襄王就是一个傀儡，“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昭襄王19岁继位，已经不算“年轻”了。献公之后，秦国君位流转有序，君主大都奋发有为。秦孝公20岁继位，亲政；秦惠文王19岁继位，亲政；秦武王19岁继位，亲政。“昭王少”这样的理由似乎勉强。其次，“魏冉为政”的局面也没有立刻出现。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政务体系已经逐步成熟，相邦是主持日常政务的首脑，谁是相邦，谁才是秦国的“为政者”。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而不是“魏冉”。这个时期，魏冉的职务是将军，职责是“卫咸阳”。魏冉初次为相，已经是在昭襄王十二年。

严君疾不是等闲之辈，他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樗里疾，秦惠文王的弟弟，出将入相，智谋过人，时称“智囊”，是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重臣。秦武王突然去世，惠文王后和武王后都是魏国人，对王位继承人另有考虑。关键时刻，嬴则能从千里之外的燕国及时赶回，成为昭襄王，除了宣太后、魏冉全力以赴之外，樗里疾的鼎力相助应该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昭襄王继位后，樗里疾成为首任相邦，在情理之中。樗里疾是军政两界的元老，是昭襄王前期的“定海神针”，昭襄王三年，惠文王后、庶长壮联合部分大臣、诸侯、公子叛乱，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任用樗里疾不是个例。惠文王时代的司马错、张若、庶长奂，武王时代的任鄙，都在昭襄王时代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续用前朝之臣，是高度自信，继承武王方略，更体现了理智沉稳。

政贵有恒

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秦之所以强于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顶层设计不会轻易改变。在昭襄王之前，武王最大的愿望就是，“车通三川，窥周室”。走出西陲，逐鹿中原，这是秦穆公以来历代秦王所愿，“车通三川”是这个目标的高度概括。昭襄王的第二个30年，秦国抓住时机，同步削弱齐楚，而后加快了东进步伐。

昭襄王之初，秦北有义渠掣肘，南与楚国有巴蜀、江汉之争。惠文王时代，司马错伐蜀，占领巴蜀。楚国对此如鲠在喉，秦楚冲突不可避免。如果不解决这两个威胁，秦国东进无从谈起。两大问题催生出昭襄王时代的双轮驱动，一南一北，处理方式一硬一软，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北方的义渠问题，昭襄王交给了宣太后，以怀柔之策笼络义渠王，长达30年，最后致命一击。楚国的的问题，只能是硬碰硬了。究竟是谁主导了攻楚的系列战役？从秦军攻楚的将领名单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昭襄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八年，将军芈戎攻楚；九年，免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二十七年，错攻楚；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郢、邓；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都南郡；三十年，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在这些秦国将领中，芈戎、白起和魏冉亲近，但是庶长奂、司马错、张若都是历经两朝，甚至三朝的百战宿将，单凭魏冉资历，实在难以统一指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昭襄王本人才是攻楚战略的总策划人和总操盘手。

当宣太后在甘泉宫计除义渠王，当楚国西部的领土变成了秦国的黔中郡、南郡、巫郡，剑指三川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从昭襄王三十年开始，秦军主力兵团由楚转向对三晋的攻伐。昭襄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

由富变强

□ 崔 庆

四年，取韩南阳；四十五年，攻韩，取十城；四十七年，攻韩上党，并在长平之战中大破赵军，三晋震惊；四十八年，韩献垣；五十一年，将军嫪毐攻韩，取阳城、负黍，西周君献城归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是秦史的一个整体单元，庄襄王元年，秦灭东周，伐韩，初置三川郡。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秦国尽有西周、东周之地，“车通三川”变成了现实。

稳中求进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昭襄王的前30年，离不开母亲宣太后的辅佐。宣太后的传奇人生，不仅秦国少有，也是史所罕见。没有这位母亲的坚忍不拔，昭襄王难以在武王之后脱颖而出。昭襄王是沉稳掌控全局的雄主，更是始终尊奉母后的儿子。

昭襄王三十五年，范雎入秦，三十六年被重用。史料记载，范雎一番谏言，昭襄王似乎幡然醒悟，削弱了太后权力，放逐了魏冉、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等“四贵”。其实，此时昭襄王是50多岁、经验丰富的老成君主，纵横捭阖30余年，岂是一番言语能够轻易改变整体战略的？这里有两点是值得品味的。一是范雎一提议，昭襄王马上就能实施，其实正是说明了昭襄王已经大权在握。二是范雎入秦多时，为什么“待命岁余”才被昭襄王接见，“车通三川，窥周室”的愿望就是，秦穆公以来历代秦王所愿，“车通三川”是这个目标的高度概括。昭襄王的第二个30年，秦国抓住时机，同步削弱齐楚，而后加快了东进步伐。

《史记》中的春秋笔法，细细品味，意蕴深长。宣太后是解决义渠问题的关键所在，完成了战略使命，昭襄王才有了让其“休息”的想法。范雎的出现正当其时，昭襄王找到了深明其意的最佳代理人。

宣太后“休息”，可绝不是打入冷宫。昭襄王只是让宣太后退出政坛一线，对其依然尊奉有加。宣太后始终保持着对王室内部事务的绝对话语权。昭襄王长寿，在位40年的时候，太子在魏国去逝。重立谁为太子让昭襄王伤透脑筋，迟迟未定。直到两年后，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被立为太子，十月，宣太后去世。安国君亲楚色彩浓重，其正室华阳夫人应是宣太后同母弟、华阳君芈戎的孙女。如果大胆推测，极有可能是宣太后自感身体不佳，想在生前为昭襄王定下太子人选。宣太后本是楚国人，便选择了安国君，华阳夫人将会成为另一位秦国太后，影响后续两代秦王。昭襄王充分尊重了宣太后意见，大秦内部政局平稳，传承有序，对外纵横捭阖，尽显虎狼之威。

如果说惠文王是让秦富重天下的经营之王，那么昭襄王就是让秦雄视天下的虎狼之王。非常之时，待非常之人，为非常之举，成非常之功，秦在昭襄王时代完成了由富变强的关键转折。

□ 车 耳 王 涛

发达国家富豪通过信托这种方式来传承资产的习惯由来已久，上个世纪上半叶美国洛克菲勒等大家族长盛不衰的背后都有家族遗产信托的支撑，而这些举措常常和税务安排有关。

1934年，罗斯福总统针对富裕阶层进行税收政策改革，大幅度提高馈赠和财产税的税率。这项政策的推出促使戴维·D·洛克菲勒的父亲开始考虑为他的每一个子女设立信托财产，以保护家族财富。由于孩子们年纪尚小、涉世未深，老洛克菲勒严格限定了每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和动用本金的条件。

老洛克菲勒的初衷是给每个子女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他们达到30岁的年龄。信托计划的部分资产的收益将支付给其子女，而另一部分则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

在信托财产刚运作的那几年，孩子们分得的钱非常少，除了支付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结余。老洛克菲勒并不会给他们额外的“补助”，而是教导他们要善于分配金钱，提高理财意识。这位智慧又具有远见的实业家认为年轻和金钱的结合是危险的，这将让孩子感到彷徨和无措，还会减少年轻人在成长期间获得指导和忠告的机会。

由于国会在1935年再次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老洛克菲勒不得不改变自己当初的策略，增加了子女们

的资产份额，将他们的信托资产提高到了1600万美元的水平。但是他却并没有随即提高孩子们每年可以获得收益的数额。就是说孩子们虽然理论上很有钱，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能随意支配。

老洛克菲勒在给子女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增长。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占主导地位……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富人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财富安全地传承给自己的后代，还不用支付巨大的成本。因为西方社会各种税赋都比较高，除了所得税、营业税这些常见税种之外，北美国家还有各州单独收取的税，就是在联邦税之下还有州税。在欧洲一些社会主义思潮曾经盛行的国家，税率常常是递增趋势，就存量来说越富裕的阶层纳税额越多，就增量来说收入越高纳税比例越大。在法国还出现过“巨富税”，就是在所有人纳税之上再多交一部分，只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富裕。

除了对活人征税之外，西方国家对死人征税更厉害，这就是他们的遗产税。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逝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当然没有留下财产就无法征税。西方国家决定征收遗产税的初衷，是通过国家对遗产和赠

予财产进行调节，来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遗产税虽然是以逝者留下的财产为征税标的，却是向遗产的继承人或者接受赠与人征收的税。在西方国家，很多富裕阶层尽管自己也是征税对象，但他们是支持对遗产实行高税率的，因为他们清楚，遗产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资产，继承人没有对社会作什么贡献却白捞了一笔财富。除了出于这种公益的考量而支持遗产税之外，一些远见卓识的人士还考虑到如何才能让子女有奋进的动力，而不是吃父母的老本。从这个角度上讲，洛克菲勒家族在1934年所设立的遗产信托就是后人纷纷效仿的榜样。遗产信托是指委托人立下遗嘱，将自己全部或者部分财产设立一个或几个基金，并把它委托给专业人士或机构进行管理。继承人则作为受益人享有这些遗产所带来的收益，但是他并不直接继承这些财产，也就不必为其缴纳巨额遗产税。

理论上讲，遗产税如果征收得当，对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尤其对于增加政府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动力有一定的作用。遗产税常和赠予税联系在一起设立和征收。但是，为了吸引投资和资金流入，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不设立遗产税或者废除遗产税。我们国家就属于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实施遗产税的。当然，改革开放前人们没有多少财产，现在虽然大家拥有财产了，但大部分个人财富都是在近几十年积累的。对于那些自己辛苦创业并经营多年的中国富豪